

## 《文心雕龙》的十大贡献

——评张国光先生对《文心雕龙》的批判

杨 树

张国光先生在《〈文心雕龙〉能代表我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吗?》(见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》第四辑)一文中认为,《文心雕龙》虽是前代“文学理论的总结”,但并没有总结好,“刘勰无论是才、学、识都是不足”,对前人的结论,“往往不是择善而从,而是把前代的许多糟粕当作精华继承了下来,甚至加以发挥。”张先生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,提出了“十证”。实难苟同。下面把“十证”归纳为六个问题,说说我们的意见。

### 一 关于《文心雕龙》的书名问题

关于《文心雕龙》这个书名,张先生说是“有些古怪”、“含义难明”、“本来就不够通顺。”关于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,刘勰在《序志》篇解释得很清楚。“文心”是“言为文之用心”,就是如何作文章,也就是作文章的道理,即文理、文性。他为什么要用“心”这个字,而不用“理”、“性”呢?他解释说:“昔涓子《琴心》,王孙《巧心》,心哉美矣,故用之焉。”张先生还认定《文心雕龙》“大量抄袭《文赋》的观点”,为了掩盖这一点,所以刘勰不敢承认“自己的书连名字也是袭自《文赋》”。这恐怕是主观臆断。《文心雕龙》在《序志》篇中论及前代论文著作时,明确提到《文赋》并给以“巧而碎乱”的评价,而且在申明自己的立论态度时,坦然指出:“有同乎旧谈者,非雷同也,势自不可异也。”我们觉得,某些观点上的继承关系,且有自己的阐发,不能说成是“抄袭”。

张先生说:“刘勰却别生枝节,又缀上‘雕龙’二字,这不仅画蛇添足,而且简直是自相牴牾。”“画蛇添足”的批评或可商榷,“自相牴牾”却难成立。刘勰解释他采用“雕龙”二字的用意说:“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,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!”这就是说,自古以来写文章。总要讲究一些修饰,所以他取“雕龙”二字以喻文章。所谓“文心雕龙”,就是关于文心的文章,这有何牴牾?战国时齐人驺奭,接受阴阳家驺衍的学说,为文浮华不实,当时齐国人称他为“雕龙奭”。刘勰的说明是辨别他与驺奭之不同,决不是什么“欺人之谈”。

张先生还引用苏联学者克利夫佐夫的两个译文来证明《文心雕龙》书名的“不通”,前一译文是:“文学思想和雕刻的龙”。克氏自称“不确切”。后一译文是:“以心写成的象雕龙一样优美的文学。”克氏较为满意。张先生说:“前一译法,不合原意,而后一译法也还是不够显豁。”我们认为不但“不够显豁”,而且这两个译文都是错误的。克利夫佐夫还没有弄懂《文心雕龙》这个书名,而张先生却要刘勰替克氏承担翻译不通的责任,恐怕不大合适吧!

## 二 关于《文心雕龙》的性质问题

《文心雕龙》一书的性质如何？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什么？张先生并没有搞清楚，因而对刘勰提出许多不应有的责难。

人们总是称《文心雕龙》一书包括五十个单篇，洋洋三万言，“体大思精”，却不仔细看看其中所谓“毛公之训《诗》，安国之传《书》，郑君之释《礼》，王弼之解《易》，要约明畅，可谓式矣”云云，与文学究竟有何关系？至于把“谱籍簿录，方术占试，律令法制，符契卷疏”，乃至“祝邪之文、骂鬼之书”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都囊括在《文心雕龙》之内，则这本书是否把主要精力用来对创作规律进行探讨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张先生嫌《文心雕龙》一书涉及的文体太多太杂，而没有写成专对创作规律进行探讨的类似现在的《文学概论》。但刘勰的研究对象是从古到今的一切“言之文”，即各种类型用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。研究任务是确立作文与衡文的基本准则，探讨各体文章的起源、演变、文体特点和写作原理，分析文章写作过程各个环节、内容形式各个方面，阐明它们的特点、作用、相互关系，找出其中规律。因此，《文心雕龙》的性质不同于今天的《文学概论》，据实定名，应称为《文章学概论》。所以《文心雕龙》中各种类型的文章无不论及，不仅不是缺点，反而倒是优点。而且他在论述中，不是平均用力，而是主次分明。象“谱籍簿录……符契卷疏”这种程式化的日常应用文，只是附带涉及而已。

张先生赞扬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纠正了《易传》“把文学与‘人文’——人类的语言文字和一切文化现象乃至天象与地貌都包括到一个‘文’字的范畴”的不科学观念，而批评刘勰“把‘文’的概念无限扩大，而且又讲得带有神秘性。”其实，曹丕在这方面并不比刘勰高明。曹丕举常见的“四科”八体作为例子，不能说经书、诸子就不在其列，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特别提到了《易》和《礼》。这说明他所说的文章，也包括经书。再说“四科”八体，也并非都是文学作品。“诗赋”一科是文学作品；书与铭诔，要作具体分析；论和奏议显然就不是了，张先生还说，“曹丕所称道的当时文人，不过建安七子而已。”可是曹丕评论他们的文章，并不限于文学作品。如他说：“琳瑯之章表书记，今之偶也。”总之，曹丕和刘勰论述的对象是一致的，都是用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，他们都没有把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界限划清楚。

张先生还认为，稍晚于刘勰的、编辑《文选》的萧统，“敢于一反传统的观点，大胆地对文学园地进行廓清”，“提出了选文应以‘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’为标准，从而使文学园地不再成为杂货摊、大杂烩，诚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。”其实，萧统的文学观念也和刘勰一样，并没有“一反传统的观点”，也没有划清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。请看萧统在《文选序》中是怎样讲“人文”的起源吧。

逮乎伏牺氏之王天下是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《易》

曰：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’文之时义，远矣哉！

这和刘勰在《原道》篇所说“人文”的起源，有何不同？这不正是张先生在赞扬萧统之前刚批判过的《易传》的观点吗？再看萧统《文选》的选录标准，也完全不是根据是否文学作品而去取。他在《文选序》里说：

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，与日月俱悬，鬼神争爽，孝敬之准式，人伦之师友，岂可重以芟夷，加以剪裁。

张先生认为，这是萧统以“巧妙”的措辞摒弃经书，是诡谲之辞。但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。我们认为萧统和刘勰推崇儒家经典的话完全是一个腔调。萧统不选经书，是因为它们是神圣的经典，不能“芟夷”“剪裁”。《诗经》是地道的文学作品，可是它被列入经典，所以一篇也没有选。史书中不乏文学作品之名篇，萧统也是一篇未选。张先生指责刘勰不从“文学的角度”评价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而对萧统不选《史记》中文学价值较高的传记，反而给予肯定。这实欠公允！实是厚萧而薄刘也！

再看《文选》的选文吧。《文选》是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、令、教、文、表、上书、启、弹事、笺、奏记、书、檄、对问、设论、辞、序、颂、赞、符命、史论、史述赞、论、连珠、箴、铭、诔、哀、碑文、墓志、行状、悼文、祭文等三十七类，和《文心雕龙》所说的文体大同小异，并非全是文学作品。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《文选》的“符命”类，恰恰是张先生痛斥刘勰列为专篇论述的“封禅”文。“符命”类选了三篇文章，正是刘勰在《封禅》篇中重点论述的封禅文的代表作。为什么这些文章在《文心雕龙》就成了刘勰淆乱文学园地的罪证，而在《文选》却不妨碍萧统成为廓清文学园地的先锋呢？

文章的分类是一个问题，论文的对象的范围又是一个问题。刘勰把一切文章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，并没有错，甚至现在也应该这样。如果谁能写出一部以当今一切类型的文章为研究对象，又能进行科学分类的文章学著作，那是很有意义的。但是，看张先生的意思是写文论著作，只能谈文学作品，不能谈非文学作品，否则就是“舍己耘人”；而且似乎研究文学作品就比研究非文学作品要高人一等，这实在毫无道理。张先生还指责说：“这种把文学作品和应用文、学术文章混为一谈的现象，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旧大学文科都没有改变，这不能不说《文心雕龙》是‘始作俑’者。”刘勰是不是“始作俑”者，姑且不谈，但我们认为：如果谁的理论既概括一切文章，又能作科学分类，且能正确阐明其特点，那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现在大学中文系，只开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课，不讲其它文章的理论，这在实际工作、使用中，未必可取。特别是外交学院，需要各种国际应用文；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培养中学语文师资，而中学语文课，不论是培养读或写的能力，都远不限于文学作品。可是，师范院校中文系却只学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概论。倘若有一部现代化的《文心雕龙》作为外交学院、师范院校的文科教材，岂不是更适用吗？

### 三 关于“宗经”的问题

“宗经”是刘勰的基本观点，是《文心雕龙》“文之枢纽”的核心。刘勰把儒家圣人和圣人的经典捧到不可逾越的高度，这确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，具有很大的保守性。但是，如果对“宗经”的具体内容作深入的分析，就会知道，它集中地体现为“六义”：“情深而不诡”，意谓思想深刻而不诡异。“风清而不杂”，乃指感情鲜明，爱憎分明，而不浑沌暧昧。“事信而不诞”是说事件材料真实不荒诞。“义直而不回”，就是所用的理论材料正确无误，合乎儒家经典。“体约而不芜”，是指结构严谨，不蔓不枝。“文丽而不淫”，是要文辞美丽生动，但不过分雕琢粉饰。这“六义”虽说是刘勰对经书的评价，但又是一套系统完整的作文与衡文的准则，是“文之枢纽”的核心。刘永济先生说：“文之枢纽，信在此矣。”是很有见地的。儒家经典是不是当得起这“六义”，或者说要达到“六义”是不是一定要“宗经”，这个问题姑且不说，但评价刘勰的“宗经”观点，一定要落在“六义”上，不能笼统地看他如何迷信和尊儒。张先生也说：“儒家思想本身并不是没有积极的一面”，所以，忌

想观点上“宗经”，在当时来说也有可取的一面。在《文心雕龙》中，固然有张先生所指出的“牝鸡无晨，武五首誓，妇无与国，齐桓著盟”以及“子弘虽伪，要当孝惠之嗣”等正统陈腐观念，但也有在历史上有进步性的儒家“仁政”、“民本”思想。如《铭箴》篇评潘尼的《乘舆箴》为“义正”，因为《乘舆箴》指出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”，规劝君主关心人民疾苦，不要荒淫奢侈，这就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体现。又如《谐隐》篇肯定“优游之讽漆城，优孟之谏葬马，并譎辞饰说，抑止昏暴。”表现了同样的思想，所以也是“意归义正”。诸如这些，说明即使是“宗经”，也有不少富于人民性的精华。总之宗经“六义”，是评价文章优劣的一套系统完整的标准，它由本及末，排列有序，要求具体，正反结合，简明精当，真可谓“深得文理”。

但是，张先生对刘勰提出的宗经“六义”，却轻率地持否定态度，他用刻薄的反语说：

如果说刘勰有“创造性”的见解，那么可以指出的有如下三点：一、他在人所共知的《诗》“六义”之外，又搞了个“宗经”的“六义”，还加上“六观”和“八体”；其实这些说法彼此重复，未免近于文字游戏。

我们认为“六义”的价值不在《诗》“六义”之下，它是“深得文理”的作文与衡文的准则；“六观”是认识和评价“文情”的一套方法。“八体”是作品的八种基本风格。三者决非“重复”，更不是“文字游戏”，让我们来看具体内容，并正确理解，让事实为证吧！《知音》篇说：“是以将阅文情，先标六观：一观位体，二观置辞，三观通变，四观奇正，五观事义，六观宫商。斯术既形，则优劣见矣。”这段话告诉我们“六观”的性质是认识“文情”（文章表达的情思）、评价“文情”的方法（“术”）。“一观位体”，就是看结构的安排。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这一术语有三义：一是体裁，二指风格，三谓结构。“观位体”的“体”，指结构。为什么要“观位体”？因为只有弄清结构安排，了解各段关系，才能把握住文章的基本思想。“二观置辞”，就是看语言的运用、弄懂语言，进而掌握思想内容。“三观通变”，值看文章内容从前人那里继承了什么，又有哪些变化，作出新的贡献，这样才能对它的价指作出正确的评价。“四观奇正”，是看表现方法是奇特还是正常。“奇”，近似于所谓浪漫手法；“正”，近似于所谓写实手法。倘若不了解表现手法的特点，势必不能正确把握文章的思想内容，就会以“奇”为“正”，或以“正”为“奇”，把“思美人”的诗都当成爱情诗，或把爱情诗理解为追求政治理想的诗，这都会误解文章的思想内容。“五观事义”，就是看用的事实材料和理论材料。材料是表现和支撑思想的，不理解文章所用的材料，就不可能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文章的思想。“六观宫商”，就是看文章声律的特点，如平仄节奏等。所有这些都和思想表达有密切关系，弄错了都会引起对思想内容的误解。由此可见，“宗经”的“六义”和“知音”的“六观”完全是两码事，彼此虽有关系，但决不“重复”，更不是“文字游戏”。

#### 四 关于反对进化论的问题

张先生认为：“宗经、征圣的思想，必然导致了刘勰对文学史采取了反进化的观点。”但是，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，“宗经”，实质上是宗“六义”。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，儒家经典被视为质文兼备的优良文学传统的代表，而“宗经”就是要求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，而且要有所创新，于是他提出了“通变”说。从“通变”说看，他的文学史观基本上是进化的，而不是反进化的。他《通变》篇中说：

夫设文之体有常，变化之数无方，何以明其然耶？凡诗赋书记，名理相因，此有常之体也；文辞气力，通变则久，此无方之数也。名理有常，体必资于故实；通变无方，数必酌于新声；故能骋无穷之路，饮不竭之源。

刘勰认为，各种文体，有一定的规格，要继承；作品的文辞，作家的才气，要变化，要革新，明显地反映了刘勰主张进化的文学史观。他就是以这种变与不变相结合的“通变”观点去观察和评价文学史上的变化情况的：

椎而论之，则黄唐淳而质，虞夏质而辨，商周丽而雅，楚汉移而艳，魏晋浅而绮，宋初讹而新，从质及讹，弥近弥淡。何则？竞今疏古，风味气衰也。

这段话最容易被理解为反进化，张先生就是这样理解的。其实，刘勰对历代文学的发展作了比较研究，看到文学创作的毛病是诡诞新奇，而不至于跟着这股歪风走。他不是反对进化，而是反对进化中的偏颇。

刘勰在《序志》篇对当时形式主义的文风斥为“离本”、“爱奇”，张先生却批评道：“其实这种‘爱奇’、‘离本’的现象，正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。”我们认为，即使说是“自然趋势”，但这种“趋势”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中一种形式主义的偏向、逆流，批判这种不健康的“自然趋势”，不但不是“保守”、“反进化”，反而正是“进化”、进步的表现。

《辨骚》篇对楚辞的评价，最能表现刘勰的文学进化观点，也最能表现他进化观点的局限性。张先生着重抓住了后者，而对前者认识不足。诚然，如张先生所说，“由于‘宗经’的思想，使刘勰对《离骚》作了不应有的贬抑。”但张先生说，“‘异乎经典’的‘譎怪之谈’与‘荒淫之意’、‘诡异之词’、‘狷狭之志’，正是《离骚》作为一部浪漫主义抒情诗的最大特色。”这也不够中肯。“荒淫之意”怎么是浪漫主义呢？“狷狭之志”虽批评得不对，但也不是否定浪漫主义。至于“诡异之辞”、“譎怪之谈”，虽体现浪漫主义特征，但要具体分析。举《天问》中的例子，可以说是属于浪漫主义，而举《招魂》中的例子，恐怕就不能说是积极浪漫主义了。从张先生的意思来看，似乎只要对楚辞褒扬就是对的，所以张先生对刘勰肯定楚辞的“同于风雅”的“四事”，未持异议。这也值得研究。其实，这“四事”中，“典故之体”、“忠怨之辞”，都是儒家封建正统思想的反映，都有局限性。其他各家评骚，也和刘勰一样都是以儒家为依据，评价无本质差别。张先生盛称刘安对《离骚》的赞扬，借以贬低刘勰对楚辞的评价。刘安赞《离骚》最关键的几句话是：“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诽而不乱。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。”这仍然是据经论骚！“好色而不淫”，固然不坏；“怨诽而不乱”，难道也值得称道吗？班固批评屈原“露才扬己”，“责数怀王，怨恶椒兰；”王逸为屈原辩护，但也不敢说怨恨君主很好，只是曲为辨解说：“屈原之词，优游婉顺”，远不如《诗经》中有些篇章言辞激切。张先生是支持王逸对班固的批评的，而刘勰不但肯定了屈原的“规讽之旨”、“忠怨之辞”，而且，既没有嫌屈原辞偏激，也没有曲赞屈原“优游婉顺”，就这点说，岂不既高于班固，又胜过王逸吗？

刘勰对楚辞思想性的评价虽与诸家大致相同，但对楚辞艺术上新发展的认识，却比诸家深刻得多。刘安、司马迁、王逸对屈原作品艺术上的特点和贡献，只指出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。王逸虽强调屈原艺术上的高超和巨大影响，但很笼统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。班固也只是笼统地说：“其文弘博丽雅，为辞赋宗。”（《离骚序》）而刘勰在《辨骚》篇一开始就说：“自雅寝声，莫或抽绪，奇文郁起，其《离骚》哉！”后文又说：“观其骨，梗所树，肌肤所附，虽取熔经意，亦自铸伟辞。”这就明确肯定了楚辞在艺术上巨大的独创性。刘勰还

对楚辞各篇的风格特点作了简明概括,指出它们“气往辄古,辞来切今,惊采绝艳,难与并能”。更重要的是,他对楚辞作为文学作品的特质,有较深的认识。前面引过的“叙情怨”、“述离居”等,已接触到文学的形象性问题,也说明楚辞作为文学作品,具有很高的艺术性。

张先生还对刘勰忽视小说而批评他思想保守、对新事物缺乏敏感性。

其实,刘勰没有落后于时代。刘歆,班固虽然把小说列于诸子“十家”之末,但并没有把它当文学作品,只是视为“有可观者”的“小道”。刘勰在《诸子》篇简述“十家”,第十家是“青史曲缀以街谈”,即指小说家。他这一讲法,倒是很能抓住原始小说的特征,这就是当时“小说”理论的极顶了。因为当时“小说”正处于原始阶段,还不是近代所指的小说,正如鲁迅先生说的:“文士之作,虽非如释道二家,意在自神其教,然亦非有意为小说。”又说:“小说亦如诗,至唐代而一变,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,然叙述宛转,文辞华艳,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,演进之迹甚明,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。”所以在刘勰时,自然不可能有现代的小说理论。

此外,象刘勰排斥神话、没有从文学角度去评价《史记》等都应该用历史的局限性去解释。勉强刘勰去认识历史不允许他认识的东西,勉强他的东西达到历史不允许的深度,那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;以此来说明他反对文学进化,也是不科学的。

## 五 关于刘勰的才、学、识问题

张先生说,“刘勰的才、学、识都比较欠缺”,还特地列举了许多证据。可是我们细读之后,觉得难以成立,且不足以说明问题。

张先生说:“《情采》篇引《易·贲卦》说:‘贲象穷白,贵乎反本。’实本《说苑·反质》篇‘质有余者,不受饰也’为言,但这与贲卦的本义相去又岂能以道里计?”按:《易贲》“上九”云:“白贲无咎。”王弼注:“处饰之终,饰反素;故在其质素,不劳文饰,而无咎也。以白为饰,而无患忧,得志者也。”“穷白”,就是“饰终反素”,“以白为饰”,亦即“反本”之义。刘勰引申得很恰当,很合乎贲卦上九支辞的本义。他以此来说明克服“采滥辞诡”的偏向还是要“反本”,即回到内容形式统一的正确轨道上来。至于“质有余者,不受饰也”,却不含有“反本”之意,并非刘勰所本。这是很清楚的。

张先生说:“《文心雕龙》有些篇什写得杂乱无章,没有理由就生拉硬扯,有时竟引用论敌的话来为自己‘作证’。老庄本来反对繁文缛辞,但刘勰偏说老子不弃美,庄子重藻饰。岂非强人从己?至于韩非,本是主张焚书的,连法家、兵家之书也不要。可是刘勰却截取其一二字来论证文须‘绮丽’,岂非失言?”我们真不知张先生指的是哪些篇什写得“杂乱无章”?《隐秀》篇有缺文,不完整,补的也不高明,算是“无章”吧!《总术》篇有讹误,算是“杂乱”吧!引用论敌的话,有何不可?只要引用恰当,不但不是“生拉硬扯”,反而更生动有力。老子口头上轻视文采,而在实际写作上都非常重视文采,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,岂不是有力地说明文采之不可缺少的吗?至于《情采》篇引庄周、韩非的话,用意根本不在说明他们“重藻饰”、“文须绮丽”,而在于说明“文辞之变”的情形。原文是:“庄周云‘辩雕万物’可谓藻饰也;韩非云‘艳乎辩说’,谓绮丽也。绮丽以艳说,藻饰以辩雕,文辞之变,于斯极矣。”刘勰认为,《庄子·天道》篇说的“辩雕万物”,讲的是语言的藻饰问题;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里说的“艳乎辩说文丽之声”,指的是语言绮丽之风。“绮丽”而达到“艳乎

辩说”的程度，“藻饰”而达到“辩雕万物”的程度，文辞的演变，是达到极点了。这就是刘勰这段话的意思。张先生的上述解释和责难，才是“强人从己，”“岂非失言”？至于张先生所谓“‘绮丽以艳说’、‘藻饰以辩雕’，叠床架屋，无非文字游戏”，又“失言”了。

张先生接着说：“还有什么‘设模以位理，拟地以置心’，尤其叫人不知所云。而‘镂心鸟迹之中，织辞鱼网之上’，用鸟迹代文字，用鱼网代纸张，这种借代法，是颇不合常情。可见刘勰写骈文的手段实在不高明，还没有达到通顺的程度。”我们认为，“设模以位理，拟地以置心”，是重迭说明一个意思，即考虑，确定文章的结构布局以安排思想内容。不知张先生为何“不知所云”。许慎《说文解字序》里说，仓颉法鸟兽之迹造文字；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中记载，蔡伦造纸，原料中有破鱼网。所以刘勰以“鸟迹”代文字，以鱼网代纸张。用典不深，借代易懂，不知张先生为何说“不合常情”？至于说什么“不高明”、“还没有达到通顺的程度”，却没有事实为证，无非是说刘勰才、学、识欠缺罢了！

关于《情采》篇“文质附乎性情”、“华实过乎淫侈”二句，张先生也认为不通，他说：“本来讲的是‘文附质’，而质即性情，现在却把‘质’归并到‘文’的概念之内；本来是反对华而不实，现在却连实也反对了，可见其逻辑的混乱。”按：关于这两句话，郭晋稀的《文心雕龙注释》译为：“认真体会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的意思，可以知道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都应该出于作家的性情；仔细细阅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的用心，就知道作品的措辞和命意都不宜太夸饰了”。周振甫的《文心雕龙选译》译为：“研究体味《孝经》《老子》的话，便知道文采或质朴的变化依附于性情；细看庄子和韩非的说法，便看到文辞和内容过于浮夸。”我们认为：（一）前句以郭译近是，后句以周译近是。（二）“质”有主有从，通常说的“质”，既含性情，也含借以表现性情的事义物象。“文质附乎性情”的“质”指从属方面。若细读品味，不难明白。“实”也是这样。

张文又说：《诗·魏风·伐檀》“河水清且涟漪”，“漪”本是语气词，但刘勰则把“涟漪”连读，并改“漪”为“漪”，作名词解。

“漪”是语气词，但“漪”作水波解，刘勰之前早已有之。谢灵运《发归濂三瀑布望两溪》诗云：“沫江免风涛，涉清寻漪涟。”左思《吴都赋》云：“雕琢蔓藻，刷荡漪涟。”既然可以说“漪涟”、“漪沓”，为什么不可说“沓漪”呢？如果说“漪”是由“漪”而生，那“始作俑”者也非刘勰。“漪”作名词水波解已司空见惯了。又如“言与志反，文岂足征？”张先生认为“征”（徵）本来是“验证”的意思，刘勰却误为“相信”之义了。其实，“征”，作“验证”解亦通，引申作“相信”讲亦无不可。倘若根据这些例子便说刘勰“引用常见书的典据也不确切”，未免是“洗垢求其瘢痕”了；进而上升为“学术之疏”，岂非又是“失言”？

至于他对重要史实的颠倒，尤其易使读者产生错觉。如他说，由于“楚广蓝台之宫”，“荀卿宰邑”，故“蓝陵郁其茂俗，屈平联于日月，宋玉交彩于风云。故知炜烨之奇意，出乎纵横之诡俗也。”按荀卿为蓝陵令在战国末年，且蓝陵在今山东，怎么说在楚怀王，顷襄王时，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创作《楚辞》的屈原、宋玉等人，反而受荀子在蓝陵讲学的影响呢？

张先生举的例证出自《时序》篇。“齐开庄衢之第，楚广蓝台之宫”两句，是说齐楚两国重视“文学”（文章著述）。“孟轲宾馆，荀卿宰邑，故稷下扇其清风，蓝陵郁其茂俗。”前两句并举孟、荀事进一步说明齐楚对“文学”的重视；后两句分承，是因果关系，前因后果，

很明确！下边讲“邹子以谈天飞誉，骏爽以雕龙驰响，屈平联藻于日月，宋玉交彩于风云”，就和孟荀无关了。刘勰虽用骈体句法，但不至引起误解。这里不仅屈、宋作楚辞与荀子作蓝陵令无关，而且二邹“谈天”、“雕龙”也与“孟轲宾馆”无关。

此外，张先生还例举古书辨伪、史传、陶渊明等问题，目的在于证明刘勰的才、学、识欠缺，愚昧无知。我们认为刘勰是个佛教徒，他相信天命鬼神，但在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，总结写作经验、探求写作规律时，却不妨碍他清晰的思路和才学识的卓越。《文心》一书，“笼罩群言”，“包罗群籍”，若偶有所失，也不足为怪。我们反而深切地感到：刘勰博览群书，学问渊博，思维缜密，见识精深，非如此，是写不出这样一部既集前人文论之大成、又富有创见的杰出的文论著作来。

## 六、关于《文心雕龙》的贡献问题

张先生完全否认《文心雕龙》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有创造性的贡献，反而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，它对前人的结论往往不是择善而从，而是把前代的许多糟粕当作精华继承了下来，甚至加以发挥。”从今天的观点看，刘勰继承前人的东西，确有糟粕，这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。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对我国古代文论所作的创造性的贡献。

概言之，刘勰对我国古代文论所作的贡献有以下十点：

一、建立了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独一无二的严密完整的、以一切文章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学理论体系。这个体系包括“文之枢纽”（作文与衡文的基本准则）、“论文叙笔”（文体论）、“剖情析采”（写作论）和由文章发展与时代、历代作家汇评文章的鉴赏与批评、作家基本修养等组成的总论。

二、提出了以“宗经”为旗帜的全面文学主张，同时把“宗经”的原则具体化为“六义”。“六义”是一套完整的包括文章内容和形式的作文与衡文的准则。

三、建立了完整的文体论体制。这个体制包括“原始以表末”（探讨文体的起源与演变）、“释名以章义”（解释文体名称的含义）、“选文以完篇”（评论该文体代表作家作品）、“敷理以举统”（阐明该文体的特点和写作基本原则）等四部分，并指出研究方法。

四、深入研究了文章构思的特点和规律，并提出“三准”论、“附会”论等命题，阐明了构思的具体步骤和方法，对写作有切实的指导意义。

五、运用朴素的辩证观点，深入阐明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，提出了文质统一观，对当时形式主义的文风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。并提出“风骨”说，要求文章要有充实明确的思想 and 鲜明充沛的感情，同时强调风骨文采兼备。

六、对作家作品的风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提出了“各师成心，其异如面”的风格反映性情的观点，并对风格形成的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；同时把风格归纳为八个基本类型，为我国古代文章风格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七、在写作上，提出并深刻论述了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，既反对忽视必要的继承而标新立异的倾向，又反对只知继承而忽视创新的因袭作风。同时指出继承和创新的基本途径和方法。

八、对于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作了广泛的研究，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。

九、深入研究了文章发展与社会现实的关系，提出了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。所谓“世情”，包括广泛的内容，大大发展了前人“音与政通”的思



想。

十、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鉴赏、批评文章的见解。首先，他指出不能正确评价作品的原因和鉴赏作品的正确态度。其次，指出鉴赏的正确途径和方法：一是“博观”，因为“观千剑而后识器，操千曲而后晓声”，“博观”才能多方面进行比较，比较愈多，鉴别愈精。二是“沿波讨源”，“披文入情”，通过形式去认识内容。并提出“六观”说，作为认识和评价“文情”的一套完整方法。

以上是《文心雕龙》的十大贡献。但须作三点说明。一、“十大贡献”并非无源之水，而是在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作创造性研究，大大发展了前人的学说。二、这十大贡献是在公元五世纪末作出的，当然受到时代的局限，存在着落后的因素。三、《文心雕龙》的内容极为丰富。以上十条，只能说是主要的，是否概括完尽，不敢作保。但我们深信，这十条都属于主要的。

要而言之，张先生对《文心雕龙》的苛求和贬斥距离“客观的恰如其分的评价”实在太远了。究其原因，一、张先生并没有仔细认真地去读《文心雕龙》，结果造成许多误解。二、张先生在很多地方不能历史地评价《文心雕龙》，提出了不少超历史的要求，使人感到不合情理。三、张先生对古代文论家未能一视同仁，偏爱曹丕、陆机……等人，而独苛责刘勰，似欠公平。四、张先生对许多问题未作深入具体分析，往往是抓住一点，不及其余，或似是而非，妄下结论，不免有些武断。

我们期望着对《文心雕龙》作出既不是过高、也不是过低的公正而实事求是的评价。

~~~~~  
(上接84页)

表》，在软件的处理上需要对单字频度表与部首表进行分类。为了减少分类所耗费的机器运算时间，我们把单字频度的分类工作分成两段进行。基于文学系统中频度较大的单字个数不多的特点，将它们用“shell法”进行分类，而对频度较小的单字以及部首的分类，则采用“基数子域互换法”（武大语言自动处理研究组所创，详见《计算机学报》1982.no.5）来进行。

## 6. 自动处理系统的算法评价

利用微机处理语言文字，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计算机存储量小、运算速度慢和语言文字信息量大的矛盾。因此，在整个程序设计中，我们将气力主要化在如何压缩信息、简化算法上，尽量使有限的存储量能有效地用于各项处理工作，并加报处理速度。

054微机用户用内存最大容量有64K字节。外存设备是软盘，用户盘为250.25K字节。其中系统程序占45K字节，还有205.25K字节可用。按音形码输入的原始数据占39K字节。平均每个汉字占9个字节（其中汉字编码占8个字节，字与字之间的空格符占一个字节。）由于《多收了三五斗》一文不长，共4,200个字，原始信息即使不经压缩，也可与系统程序共占一个软盘。但考虑到今后处理较长文章也不用换盘或少换盘的需要，我们在处理之前仍对原始信息进行了压缩。根据MBASIC语言的特点，一个整数可用2个字节表示，故考虑到将输入计算机内部的每个汉字与一个整量对应起来，这样在内部处理时便可节约四分之三的存储量。加上原文经压缩后所得的字号文是一个等长码，跟原文的不等长码相比，大大简便了处理过程。